

“世界城市” World City

——国际经验与上海发展

International Lessons and Shanghai's Development

周振华 陈向明 黄建富 主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世界城市

——国际经验与上海发展

International Lessons and Shanghai's Development

周振华 陈向明 黄建富 主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城市:国际经验与上海发展/周振华,陈向明,
黄建富主编.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ISBN 7-80681-413-2

I. 世... II. ①周...②陈...③黄... III. 城市
经济-经济发展-对比研究-上海市、世界-文集
IV. F299.275.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9873 号

世界城市——国际经验与上海发展

主 编:周振华 陈向明 黄建富

责任编辑:吴 宏

封面设计:闵 敏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 sassp@sass.org.cn

经 销:新华书店

照 排:南京理工排版校对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颀辉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毫米 1/16 开

印 张:20.25

插 页:2

字 数:363 千字

版 次: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01—1200

ISBN 7-80681-413-2/F·039 定价:3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撰 稿 人

周振华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导论、第四章)
陈小红	台湾政治大学教授	(第一章、第十章)
Saskia Sassen	芝加哥大学教授	(第二章)
谢守红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第三章)
沈开艳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第五章)
Anthony M. Orum	芝加哥伊利诺大学教授	(第六章)
洪民荣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第七章)
K. C. Ho	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	(第八章)
吕大乐、赵永佳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第九章)
Kim, Won Bae	韩国人力安排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第十一章)
Machimura Takashi	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	(第十二章)
陈向明	美国伊利诺大学芝加哥分校教授	(第十三章)
宁越敏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 and 区域发展研究所教授	(第十四章)
杜德斌	华东师范大学西欧北美地理研究所教授	(第十五章)
陈 维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第十六章)
诸大建	同济大学教授	(第十七章)
黄建富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	(第十八章)

Authors

Zhou Zhenhua,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t the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face, Chapter 4)

Chen Xiaohong, Professor, Politics University of Taiwan (Chapter 1, Chapter 10)

Saskia Sassen, Professor, Chicago University (Chapter 2)

Xie Shouhong,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Chapter 3)

Shen Kaiyan,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t the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apter 5)

Anthony M. Orum,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 (Chapter 6)

Hong Minrong,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apter 7)

K. C. Ho, Professor,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Chapter 8)

Tai-lok Lui, Stephen W K Chiu, Professor,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hapter 9)

Kim, Won Bae, Senior Fellow, Korea Research Institute for Human Settlements (Chapter 11)

Machimura Takashi, Professor,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Chapter 12)

Xiangming Chen,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 (Chapter 13)

Ning Yuemin, Professor,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Chapter 14)

Du Debing, Professor,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Chapter 15)

Chen Wei,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t the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apter 16)

Zhu Dajian, Professor, Tongji University (Chapter 17)

Huang Jianfu, Doctor of Economics,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t the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apter 18)

导论(代序)

21 世纪,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已成为两大主流趋势。在这两大主流趋势不断相互交织与融合,并使全球网络化日渐显现的背景下,城市作为全球网络化的重要节点,其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特别是世界城市在全球网络中将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正如卡斯蒂尔斯(Manual Castells, 1996)在《信息社会的兴起》中指出的,世界性城市在全球社会转变中具有基础作用。因此,不管是从全球战略角度出发,还是从国家战略来讲,世界城市的建设与发展都是十分重要的。特别对于后起发展国家,更是如此。

一、世界城市的基本内涵及其变化

世界城市这一现象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并被作为一个专门的考察与研究对象,首先要提出或所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城市才是世界城市?也就是,世界城市基本内涵的界定问题。

关于世界城市的基本内涵,不能用一种静止的、绝对的方法来界定,简单给出一个永恒的定义。因为世界城市本身的现实发展,在不断赋予其崭新的内涵。与此同时,对世界城市的研究也随之不断深化。从这一角度讲,我们对世界城市基本内涵的认识及理解,只能是动态的、相对的。

从学说史的角度讲,世界城市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早在 1915 年杰德斯(Patrick Geddes)就提出过这个概念,它是指那些在世界商业活动中占有一定比例数量的城市。在当时,那些世界商业活动高度集聚的城市便被视为世界城市。但对世界城市开始进行比较深入地系统研究,则是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的事情,其中也经历了一系列理论演化与发展。

早期世界城市的研究者,建议主要从全球性特征和跨国合作经济的角度来定义与探索世界城市(Hall, 1996; Hymer, 1972; Heenan, 1977)。他们通过分析和排列全球性活动的地理位置选择偏好以及跨国公司(MNC)总

部在发达国家中的作用,来确定某些世界城市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以后,弗里德曼(Friedmann)从新的国际劳动分工角度,于1986年提出了所谓的“世界城市假设”的独创性理论,并进一步提出了18个核心和12个半外围的世界城市的等级结构和布局(Friedmann,1995)。弗里德曼的世界城市等级层次理论是建立在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中把主要城市作为资本控制中心的基础之上的。所以,他把世界城市等级理论依赖的几个主要分析标准确定为:主要金融中心;跨国公司的总部(包括地区性总部);国际化组织;商业服务部门的高速增长;重要的制造中心;主要交通枢纽和人口规模。尽管以后在世界城市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提出了许多更新的观点,但该理论仍然被认为是考察全球范围内城市间相互关系的一般性基础理论。

沙森教授(Sassen,1991,1994,1995)则通过对全球领先的生产性服务公司的分析来诠释世界城市,强调从服务业的国际化、集中度和强度角度来定义世界城市。沙森教授(Sassen,1991和2001第2版)把全球性城市定义为发达的金融和商业服务中心。据此,世界城市被设想成为这个时代服务性产业领先者的集聚地。显然,这与弗里德曼把世界城市作为一般“指挥中心”的初始想法不同。因为按照沙森教授对世界城市基本内涵的界定,世界城市的本质是为全球资本提供服务的地方而不是它的具体管理,所以弗里德曼那种“集中化的指挥部”并不能成为世界城市本质性的东西。

在此之后,卡斯蒂斯(1996和2000年的第2版)从全球流动空间的角度,把世界城市描述为世界范围内“最具有直接影响力”的点以及中心。此外,还有不少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世界城市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进一步丰富与发展了世界城市理论研究。

台湾学者陈小红教授在本书中把世界城市理论归纳为四个主要研究取向,并对其作了简明扼要的评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世界城市理论研究的总体情景。沙森教授则在其开创性世界城市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世界城市新概念框架,通过七个假设来分析有关资料,并对世界城市范式进行理论化研究。这些世界城市理论研究,为我们今天重新认识与深入考察世界城市问题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

理论是反映现实的本质,现实之树常青要求理论与时俱进。世界城市的概念及其认识,同样要有动态性,能反映时代的变化及其特征。我们今天来谈论世界城市,或指导世界城市建设与发展,不能囿于原先的框架,停留

在传统的定义与概念之上,而要赋予其新的内涵。

传统的世界城市概念,往往是指一些人口规模、经济体量、地域面积庞大的超级大城市。在此概念框架下,若要取得世界城市的资格,这个城市必须具有一些在数量上不均衡的本质属性。在某种意义上来讲,要按照全球的标准:大规模,实力强大,非常重要的地位等。一个拥有以上特点的“大”城市,就会被定义为一个世界城市。尽管从拥有数量上不均衡的属性判定世界城市要优于从性质上认定世界城市,但这只是注重了城市的空间存量,强调了自身地域的财富积累与规模扩大。

在全球化与信息化的背景下,世界城市的内涵发生了变化。正如沙森教授在本书中指出的,世界城市产生的动力机制及其进程也是全球性的。世界城市的本质属性,更多地表现为在全球化中的连通性。一个城市是否具有世界城市的功能,关键在于其融入各类世界网络体系的程度。因此,城市规模、体量等大小已不再成为衡量世界城市的主要标准,一些传统的超级大城市也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世界城市。

卡斯蒂尔斯(Castells, 1996)曾指出,世界性大城市继续积累其财富和权利的过程,是与“先进服务,生产中心,全球网络市场相联系的”^①。简要地说,世界城市的产生与再发展是通过其流量(例如信息、知识、货币和文化等流动),而不是它们的存量凝结(例如城市形态和功能)来实现的。他认为,世界城市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通过生产和消费高级、先进的服务及其促进该城市发展在全球网络中发生联系。如果我们进一步把世界城市看成是卡斯蒂尔斯(Castells, 1996)所说的全球网络和连续性生产过程,那实际上就是一个空间流量的问题。

全球化与信息化对世界城市的内涵变化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全球化通过越来越广泛的联系,拓展了城市空间流量的范围;信息化则通过加快各种要素流动的速度与效率,增大(扩大)了城市空间流量的容量。为此,谢守红和周振华教授在本书中分别从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角度论述了世界城市发展变化的新动向,以及世界城市如何适应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的战略思考。

尽管世界城市的内涵随着新的背景出现而发生变化,但并不因此而完全否定其传统内涵中的合理部分。事实上,城市的空间存量与空间流量有其内在关系。若没有相当规模的空间存量,就很难有较大的空间流量。当

① Castells, M., 1996,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Blackwell, Oxford, p. 380.

然,不能反过来讲有多大的空间存量就必定有多大的空间流量。因此,我认为要从城市空间存量与空间流量相结合的角度来界定世界城市的基本内涵。一方面,世界城市是庞杂的世界范围内的各种要素流动的交换与计算中心;另一方面,世界城市本身又是一个物质的、动态的、庞杂的集合体。

二、世界城市网络体系

与世界城市内涵变化相联系,在对世界城市外延边界的确定上,存在着不同的理解与认识。

一种比较狭义的理解,就是把在世界城市系统中一些处于支配地位的城市视为世界城市。也就是,把世界城市看成一个独特的城市层(Marcuse and Van Kempen, 2000)。其独特之处,就在于其在整个世界城市系统中处于支配地位。如沙森教授(Sassen, 1991)在《全球城市》一书中指出的一些处于支配地位的城市(纽约、伦敦和东京)。

与此不同,一些学者从世界城市的空间流量角度,强调全球性联系的重要性,对世界城市作了比较广义的理解。他们认为,虽然全球化是一个不平衡的过程,但有证据表明,每个城市都是这个世界城市系统构成的一部分,它们作为全球商品、服务的提供者和市场,作为资本、思想流动的轴心而存在。一个城市提供较少数量的资本服务,并不意味着其缺乏全球性的联系。因此,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的全球范围内来构想世界城市(B. Derudder, P. J. Taylor, F. Witlox and G. Catlano, 2003)。

按照这种广义的理解,可以把许多规模并不很大,但具备了一些独特的、混合性质的资本服务功能,特别是有着较广泛全球性联系的城市纳入到世界城市体系中来。如布朗(Brown)等人认为,迈阿密在世界城市网络体系中扮演了某种专门的职能:它虽不是主要的世界城市,但它扮演了中美洲和全球经济连接门户这一关键性的角色。

英国拉夫堡大学(Loughborough)地理系学者所组成的世界城市研究小组(GaWC)在对世界城市网络的研究中,把世界城市网络体系特定为各单元互相链锁的网络(Taylor, 2001)。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网络有三个层次:网络层次,指在全球经济中的城市联系;节层次,指城市仅次于节的层次,指服务性公司提供的现代服务。他们强调,正是在服务性公司提供的现代服务这个层面上,世界城市网络体系才得以产生。

在全球化背景下,通过全球现代服务来具体诠释世界城市网络体系,其方法的理论基础可以追溯到沙森(Sassen, 1991, 1995, 2000)对全球经济中

的地方和生产的研究。沙森^①认为,应更多地关注这些服务产生的过程。服务性公司的位置选择决策现状表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似乎一种新的集中趋势正在出现(Swyngedouw, 1997)。现代服务性公司正利用其全球网络,向其任何可能的客户提供服务。因此在世界城市网络体系的分析中,首先应该关注的是这些公司的位置(区位)决策。也就是说,分析现代服务在特定地点的集中化是具体诠释世界城市网络框架的基础。

尽管这类服务性公司的位置(区位)选择具有集中化倾向,但为了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提供服务,其仍然在全球遍设子公司、分部,从而形成全球性的网络。网络中的每一个子公司、分部都代表着其服务在全球的具体分配,这是其位置(区位)决策在全球范围内实施的结果。从这一角度讲,世界城市可以看成是众多的服务性公司实施其全球位置决策的聚合作用结果。其下各种子公司、分部构成的“公司塔”,正是网络中的节点。与城市相关的信息、知识、思想、人员、指令等要素,正是通过这些节点流动的。

在世界城市网络体系中,其联系性的强弱程度决定了不同城市的地位与职能。一般讲,联系性较弱的城市,会在其所在地区形成区域性的地位与职能;联系性较强的城市,会超过其所在地区形成全球性的地位与职能。例如在早前的相关研究中,通过对全球化背景下的欧洲城市的空间分布的分析(Taylor 和 Hoyler, 2000),发现英国城市对全球化的反应方式是相似的,但伦敦是一个例外。伦敦作为世界城市网络体系中联系最紧密的城市之一,它具有不同于其他英国城市的特征,表现为“非英国”(实际上是“非欧洲化”)的地位与职能。

如果根据城市的联系性强弱程度来排列,整个世界城市网络体系就是一个“金字塔”形状。大量处于网络体系底层的城市,只具有地区性职能;相当一部分处于网络体系中层的城市,具有区域性职能;少数处于网络体系顶层的城市,则有着全球性的职能。(图 0-1)

尽管对世界城市外延边界有不同的理解,而且处于世界城市网络体系不同位置的城市具有不同的职能,但世界城市发展的内在趋势则是一致的。也就是,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进程将不断增强全球与地方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的联系,城市间各种要素流动的迅速增加使得全球各城市的联系更加紧密。同时,全球流动的增长使城市中全球势力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城市之

^① Sassen, S., 1995, *On Concentration and Centrality in the global city*, in P. L. Knox and P. J. Taylor (eds), *World Cities in a World-Syste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63.

间的经济网络开始主宰全球经济命脉,并涌现出若干在空间权力上超越国家范围、在全球经济中发挥指挥和控制作用的世界性城市。为此,沈开艳博士在本书中对 21 世纪世界城市发展趋势作了预测性分析,前瞻性地揭示了世界城市发展中的若干共性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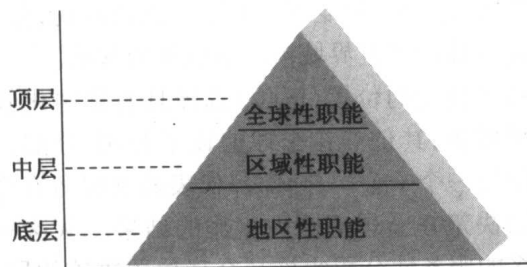


图 0-1 世界城市网络体系

三、世界城市发展之路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世界城市并不是突然从“石头里蹦出来”的,而是在城市化及城市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演化出来的一种高级形态。因此,考察世界城市的发展,首先要置于城市化的历史过程之中,使其具有历史演进的延续性。

在本书中,奥尔姆教授总结了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美国城市建设与发展的历史过程,详细描述了美国城市发展史上两个重要时期(工业革命和二战以后)的一些内在因素,以便使人们更好地理解 20 世纪中期许多美国工业城市走向衰落的原因,以及对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美国城市的新变化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

洪民荣博士则通过对英国城市化及伦敦等大城市的考察,总结其在长期的城市化进程中既有世界城市化发展的一般特性和轨迹,例如大城市的膨胀及其相伴随的“城市病”问题;但同时又形成了自身的特点和方式,例如在城市结构调整和城市分散化中所采用的新镇建设计划和城市发展公司形式。这同样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世界城市演化的历史范例。

然而,对城市化及城市建设与发展的历史分析,仅仅为我们研究世界城市提供了一个背景铺垫。对于世界城市发展之路的探索,必须研究其内在的动力机制及外部环境条件对其影响。在这一问题上,也存在不同的看法及研究思路。

一种具有代表性的看法,是把世界城市发展与城市竞争力联系在一起,

视城市竞争力的提高是促进世界城市发展的内在动力,强调走“城市积累”之路。大约12年前,Harver就观察到全球化的冲击、城市间竞争所带来的影响和一些具有竞争力城市的发展前景。他认为,正是因为城市间竞争及城市经营大大拓展了发达国家各种新型的城市发展空间。这导致了一系列科学园区、现代化中心、世界贸易中心、文化娱乐中心和有后现代设施的大型购物中心等的产生(David Harver, 2000[1989])。

德斯(Deas)和佐丹奴(Giordano)强调了城市竞争力的根源就是“呈现在每个地理意义单元上的最初的资产存货”。作为这个理论的结果,就是各个公司不断地增加自己的资产实力。克鲁格曼(Krugman)从宏观经济角度阐述了城市竞争力的概念。他认为,城市的成功就是在本地范围内的储蓄聚集。在这种理念指导下,其实践往往是通过利用这个城市所拥有的本土化资源,将其重新创造为一个知识丰富并拥有不同文化流向的新型城市。

在本书中,新加坡国立大学 K. C. Ho 教授在审视新加坡40年发展过程的基础上,总结了新加坡制定与实施竞争性城市经济政策的经验,例如竞争性的经济政策要与制度类型相匹配,通过相应的组织机构来实施;随着竞争性城市经济政策内容的变化,制度参与者也要有退出与进入;在危机、衰退和繁荣的不同时期,需采取不同的竞争性政策,并有不同类型的制度安排选择。

另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把世界城市发展与提高国际化程度联系在一起,强调走“城市流动”之路。在这种观点看来,“一个城市的国际竞争力与他作为国际城市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也就是说,一个城市如果没有与网络系统中的其他城市相连,它也可能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正如一个城市没有很强的竞争能力,它也会被连接到国际网络系统中。Kresl解释了为什么不用提高一个城市的国际化程度,它也会在竞争能力以及国际竞争能力上有大幅度提高的原因。这些学者强调,世界城市之所以要突出其外部联系与流动,是因为世界城市作为全球经济中一个节点,其在全球经济中的战略重要性是由它的联通性来体现的。

从这一角度讲,一个城市只有在世界范围的流动中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城市想融入世界城市网络,它必须要在时空上进行拓展,与世界其他城市建立联系和流动。这就要改变城市如何定位的方式,而且要重点考虑城市相互间的联系及流动。香港中文大学吕大乐、赵永佳教授在本书中强调指出,香港之所以能在东亚地区贸易网及商业网中发挥关键作用,并在战后几十年里取得经济发展的成就,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香港与全球的联系。

如果一旦人们不再认为城市是一个有着很强的行政地域限制、要素高度集聚的地方,而将其视为一个流动空间,那么城市竞争的观念就会发生变化。因为世界城市更主要的是一种交换网和计算网的中心,而不是传统意义上最具经济竞争力的上层结构^①。对城市经济来说,资源或要素不再是只增不减,而是与城市流动的情况有关。而在这些不同的“计算中心”之间,首要的并不是互相竞争。为了全球经济的发展,它们之间更需要的是合作与协作分工。

我认为,前一种观点或多或少代表了早期世界城市发展路径,更多地反映了工业化时期传统世界城市发展模式;后一种观点更多地体现了现代世界城市发展路径,反映了顺应全球化与信息化要求的新型世界城市发展模式。当然,迈向世界城市离不开提升城市竞争力,特别对于后起发展的城市来讲,提升城市竞争力是其迈向世界城市的基础。即便如此,后起发展城市也要看到全球化与信息化带来的新变化,通过城市流动以及与全球建立广泛联系来提升其城市竞争力,充分发挥其后发优势,走出一条新型的世界城市发展道路。

在世界城市发展过程中,除了其内在动力机制或作用机制外,外部环境条件对其的影响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外部环境条件的变化,会直接影响或导致一个城市迈向世界城市的路径选择。正如吕大乐、赵永佳教授在本书中分析香港走向世界城市时指出的,在香港与邻近地区一体化的背景——尤其是香港逐渐卷入中国国家发展的背景下,香港的经济发展并没有进一步地走向世界与全球化(就加强动态经济的独立性以及解除对单一民族国家的依赖而更深融入全球经济而言),反之却逐渐融入中国更大的、国家经济市场化的进程中(这反过来又在多方面受制于经济全球化)。因此,香港正逐步走向成为中国的世界城市。从分析角度来看,这一转化显示了国家在全球及地方之间的交互作用时所产生的辩证互动。为此,他们强调在研究世界城市发展时必须超越“全球——地方”的二元二分的空间,清楚地认识到全球化以及国家在重组世界城市中各自所发挥的不同作用。

总之,越来越多的学者从内部动力与外部环境条件的结合上来研究世界城市发展之路,而不是片面强调某一方面。陈小红教授用全球化指标对台北和高雄进行了实证分析,以检视这两大城市作为“世界城市”之条件是

^① Amin, A., 2000, Spatialities of globalisation, Global Conference on Economic Geography,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5~8 December, p. 18.

否成熟,同时也对实现“世界城市”目标的具体策略以及与外围区域间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以透视这两个城市迈向“世界城市”的潜力与限制。韩国人力安排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Kim, Won Bae* 则明确指出,汉城必须在逐渐变化的地区和世界环境中重新定位,并分析了汉城目前作为世界城市所处的位置、汉城的潜力和弱势、汉城的前景和战略,从而提出汉城有更好的机会成为东北亚的地区性世界城市。这意味着汉城的发展肩负着世界性和地区性的双重任务。

最后要提及的一点是,世界城市发展之路,不仅要从城市的兴起过程来研究,而且也要从其衰落来考察。东京曾经被看作是与纽约、伦敦相媲美的世界城市,然而现在尽管经济活动规模依然庞大,但就其在全球城市中的等级地位来说,正在走向没落。日本早稻田大学 *Machimura Takashi* 教授在本书中对东京这一衰落中的世界城市进行了考察,指出一个城市的世界化政策失败并不意味着全球化的终结,相反,它恰恰意味着进一步全球化的开始或者再全球化。为此,他提出了东京再全球化中的三个基本主题,那就是危机、幸福的结局、生存之道。这种从截然不同的视角进行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从全球经济的角度对世界城市的形成和重建进行更为全面的理解。

四、培育与建设世界城市:上海如何行动?

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十年里,越来越多的城市意识到有必要不断融入到全球经济的浪潮中去。一些城市在全球化中,给自己提出了更高的定位:他们的目标是成为像目前很少有的世界城市。培育与建设世界城市的任务也由此而提出来。上海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大型城市,肩负着建设“一龙头,四中心”的重任,自然要向世界城市的目标迈进。90 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则为上海建设世界城市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有了全球化中的城市定位,关键就要看如何去实现这一目标。对于上海来讲,虽然不可能很快实现这种目标,但必须要有一个逐步趋近于目标的、有效的竞争策略。美国伊利诺大学陈向明教授利用城市竞争“嵌入”过程的分析框架这样一种系统方式,来分析在众多力量和区位层面相互作用的环境中的城市竞争过程,提出如何选择和实施有效的竞争战略,把比较优势变成令人满意的竞争结果,以及如何处理好竞争战略与竞争结果的复杂关系等真知灼见,为上海参与全球竞争的城市定位及竞争策略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国际经验表明,在培育与建设世界城市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要有意识地构建和形成高级劳动力国际流动模式。因为世界城市的合作性质意味着像伦敦、纽约、新加坡和东京这样的城市都会吸纳全球经济中高级劳动力的国际移民(Beaverstock, 1994; Beaverstock 和 Smith, 1996; Findlay et al. 1996; Hamnett, 1995; Sassen, 1994)。高级国际劳动力在跨国公司(TNCs)办公网络中的集中与流动,对发挥世界城市的首要功能,特别是先进的服务行业有积极促进作用(Beaverstock, 1996; Sassen, 1994)。在目前情况下,高级劳动力的国际流动,不仅是世界城市形成的重要原因,而且也是重构及其使世界城市原有劳动力市场全球化的重要因素(Beaverstock, 1994)。休斯敦、得克萨斯、旧金山以及加利福尼亚等城市拥有大量的国外出生的移民,这清楚地表明美国经济和当地城市经济正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密不可分。

为了吸纳国际高级劳动力,必须构建国际金融体系的空间组织以及大力发展与此相配套的现代服务业(广告、管理咨询等)。伦敦、纽约、香港和东京是全球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因此,这些城市都通过高度集中的外国银行、证券公司和其他关联服务业来支持其金融市场,从而高级劳动力的流动会高度集中于这些城市中间(Beaverstock, 1994, 1996)。因此,国际熟练移民是一个世界城市服务生产达到全球化能力的重要表现。同时,“跨国精英是世界城市中的主导阶层,这个城市为了满足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职业需要而安排的……”^①。

上海正朝着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经济中心、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的目标努力,其主要措施就是对外开放,提高国际化程度,包括吸纳国际熟练劳动力及移民。宁越敏教授在本书中重点探讨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对上海经济发展,特别是对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的影响,进而分析了对上海建设世界城市的影响。杜德斌教授则对跨国公司R&D机构大举进入上海予以高度重视,认为这对于增强上海的创新投入、优化其创新资源的配置、提升城市产业和功能升级都将大有裨益,并将带动地方创新组织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为此,上海应抓住机遇,积极改善投资环境,大力吸引跨国公司的R&D投资,积极创建国际产业研发基地,以提升其城市创新能力,成为具有创新竞争力的世界城市。

^① Friedmann, J. and Wolff, G., 1982, *World City Formation: An Agenda for Research and Ac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p. 322~323.

世界城市的培育与发展,不仅仅在经济建设方面,而且是多元的综合性建设。因此陈维教授从一个更高的层面考察了世界城市所具有的城市魅力。他精辟地指出,世界城市魅力的产生是一个过程:凭借城市综合竞争力产生强劲影响力;城市的独特优势及发展潜力增强城市吸引力;良好的制度环境和文化氛围营造浓郁亲和力;城市辉煌的未来前景深具发展想象力。而巨大的想象力又提升了城市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加强城市的亲和力。在如此良性循环中,不断完善和增强城市的魅力。诸大建教授则从其中一个方面深入探讨了上海都市文化的结构类型和时空布局,对上海都市文化发展提出了新颖的见解与建设性意见。

在世界城市培育与建设中,不仅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该城市的全面发展上,而且更要充分细致地考虑都市—区域关系,以及与内、外资源的竞争合作关系。因为世界城市发展中的等级化趋势与区域化趋势是相互影响的:全球化过程体现出不平衡的特点,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少数几个核心性质的全球化区域。例如在弗里德曼(Friedmann, 1986)的世界城市网络体系中,其等级化趋势的区域性体现在三大地区,即亚洲的太平洋区域、北美和西欧。此外,如 Talor(2000)提到的,与这些地区相比较,那些联系性较弱的地区更可能形成泛地区化的特征。因此,世界城市的培育与建设要放到一个区域范围来考虑,融入到周边的城市群之中。黄建富博士在研究世界城市与城市群关系的基础上,通过若干世界城市与周边城市关系的具体案例,强调了上海建设世界城市必须融入长三角城市群的重要性,并具体考察了长三角城市群的现状与问题,提出长三角城市群发展的对策思路。

总之,世界城市培育与建设涉及许多方面,并会遇到各种新变化与新问题。本书只是提出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方面,或一些思路性的想法,起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能引起大家对此问题的关注,并进一步展开全面系统的研究。

参考文献

- Amin, A. , 2000, *Spatialities of globalisation*, Global Conference on Economic Geography,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5~8 December.
- Beaverstock, J. V. , 1994, *Re-thinking skilled international labour migration: world cities and banking organizations*, *Geoforum* 25. 323~338.
- Beaverstock, J. V. , 1996, *Sub-contracting the accountant! Professional*